

麥

田

人

文

書寫文學的過去

文學史的思考

陳國球·王宏志·陳清僑／編



書寫文學的過去 文學史的思考

○年代末期，「重寫文學史」的活動大陸學界蔚成風潮。藉著史料的重整、律的再思，有心學者反省以往文學研的洞見與不見，並由此探觸歷史本身權威與權宜。「重寫文學史」因此不只是簡單的學術新招而已，它代表知識分子在巨大政治壓力下，對歷史及文學所做的批判性回應。而回顧彼時台灣文化、政治界的變化，種種以「重寫」為名的行動，可謂與彼岸相互輝映。從理論的觀點來看，文學史總是應該被不斷重寫。文學的創作與生產模式與時俱變，文學欣賞的品味及尺度也必須推陳出新。由此類推，大歷史的認知與記錄何嘗不是一段持續重寫的過程。但是是什麼樣的錯覺，使我們以為一時一地的文學準則，可以化作永久的金科玉律？是什麼樣的信念，使尊重傳統成為故步自封的藉口？又是什麼樣的力量，使歷史在某些社會中變成不辯自明的神話？基於以上的思考，《書寫文學的過去》提出一系列論文，對中國文學史重作詮釋。作者的用心不再限於推翻前人，而更在於展現文學史閱讀及創作的駁雜線索。也唯其我們勇於重寫文學的過去，才更能開拓文學的未來。本書的編者為香港學術界又一輩中堅，他們立足香港，合兩岸三地近年重寫文學史的成果，本身已為「重寫文學史」的意義與方式，做下最佳詮釋。

書寫文學的過去：文學史的思考 = Writing the
literary past : reflections on literary
history / 陳國球, 王宏志, 陳清僑編 --初版.
--臺北市：麥田出版：城邦發行，民 86
面：公分，--（麥田人文；14）
ISBN 957-708-472-9(平裝)

1. 文學－歷史－論文，講詞等

810.9

86001437

編者簡介

陳國球

香港人。香港大學中文系博士，加拿大比較文學碩士。曾任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主任，中西文學批評研究課程主任。現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中國文學高級講師，人文學部研究生課程主任。著編有《香港地區中國文學批評研究》、《唐詩的傳承：明代復古詩論研究》、《鏡花水月：文學理論批評論文集》、《胡應麟詩論研究》、《中國文學史的省思》等，並主編《文學史》集刊。

王宏志

香港大學文學士、哲學碩士、英國倫敦大學哲學博士。曾任教香港大學中文系，現為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教授，兼國際交換計畫學部副主任。著有《思想激流下的中國命運——魯迅與左聯》、《文學與政治之間——魯迅、新月、文學史》及《Politics and Literature in Shanghai》、《The Chinese League of Left-Wing Writers, 1930-36》。

陳清僑

香港大學文學士及哲學碩士，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比較文學學博士。曾任教香港嶺南學院英文及翻譯系，現職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副教授，並為人文學科研究所香港文化研究計畫主任。曾任《文學史》及《天安門評論》等叢刊編輯委員，自一九九四年以來主編《香港文化研究》期刊，並致力策劃「香港文化研究叢書」，分別由香港中大人文學科研究所及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著作載於港、台、大陸及海外多種學術論叢及期刊，包括《現代中國文學》、《東方文化》、《清華學報》、《學人》及《八方》等。

麥 田 人 文

王德威／主編



麥田人文 14

書寫文學的過去

——文學史的思考

Writing the Literary Past: Reflections on Literary History

編者／陳國球 (K. K. Leonard Chan)

王宏志 (Wang-Chi Wong)

陳清僑 (Ching-Kiu Stephen Chan)

主編／王德威 (David D. W. Wang)

責任編輯／林秀梅

發行人／蘇拾平

出版／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

電話：(02) 396-5698 傳真：(02) 357-0954

郵撥帳號／18966004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凌晨企業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536號

初版一刷 一九九七 (民八十六) 年三月十五日

售價 三六〇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708-472-9

Writing the Literary Past: Reflections on Literary History
Copyright©1997 by K. K. Leonard Chan, Wang-Chi Wong,
Ching-Kiu Stephen Chan.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and reviews.

Edited by David D. W. Wang,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ublished by Rye 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11F, no. 213, Sec. 2, Hsin-Yi Rd., Taipei Taiwan.

【導言】

文學史的思考

陳國球

壹、林傳甲《中國文學史》與文學史的思考

中國文學的傳統論述當中，並不缺少近似現代文學史的思辨，對文學的傳承及其相關現象做出解釋和總結，但「文學史」作一個學科概念的名稱，還是在二十世紀之初才出現。現時學界對中國最早出現的文學史是否為林傳甲在一九〇四年寫成的《中國文學史》，並未論定；但以這本書的面世時間和流通過程來說，肯定可以成為早期中國文學史著的代表^①。通過這本著作的檢討，或者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個時段的傳統文人如何接受「文學史」這一個概念；再由此出發，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文學史書寫活動的有關問題。

(一)

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林傳甲受聘京師大學堂講授國文，爲了配合大學堂章程要求講習「歷代文章源流義法」，就編成一本七萬餘字的講義，題爲《中國文學史》^②。全書凡十六篇，其篇目完全採自當時的《奏定大學堂章程》（一九〇三）「中國文學專門科目」的「研究文學之要義」各款，再「甄擇往訓，附以鄙意，以資講習」^③。作爲「教科書」而不是「專家書」這個定位^④，正好點明了文學史與教育的密切關係。教育本就是一種傳承的活動。民族文化記憶，需要以不同形式的教育傳遞、組織成篇，由是「過去」才會與「現在」構成血脈的關聯。在林傳甲當日，相對於聲光化電等西學，文學不算是「急務」，也不易見「實效」；然而，正如《中國文學史》開宗明義說：「我中國文學爲國民教育之根本。」（頁一）在這種歷史擔承的意識底下，書寫民族文學的過去，是使當前不絕如線的文化體認得以維繫的有力行動。

由此可見，文學史在中國面世之初，「致用性」已經是其中最主要的書寫傾向。今天我們或者會批評這本文學史「觀點陳舊」、「體例不純」^⑤，這種論斷不可謂不得肯綮，但若果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去觀察林書的思考方向，林傳甲其實是非常著力去迎合當世時務的；例如說：

英、法、德、俄因拉丁以爲國書，且以識字人數逐年比較，以徵民智之開塞、科學之盛衰；吾願黃帝神明之胄宜於文學、科學加勉矣。（頁三）

西人字母亦大分大楷、小楷兩種；東文字母亦片假名、平假名二種；其字形大同小異，亦與大篆、小篆略同。中文用大篆少，小篆多；西文亦用大楷少而小楷多也。（頁六）

傳甲此編，近法笹川古田中根之例，然其源亦出歐美，日本帝國叢書，尚有英獨佛各國文學史，皆彼中詞章之學也。

傳甲欲譯而未能，願俟之來哲，俾言治化者知詞章之不可廢也。（頁五二）

西國文學史之外，有科學史。中國作史之才，苟充其詩話之量，作科學史，不亦善乎？

（頁一六三）

我們在看看到大小篆與大小楷的一類比附時，或者會失笑而蔑視，但在此之餘，有沒有想到當時傳統知識分子的苦心孤詣，在極其有限的知識範圍內，去搜索回天之術？

至於體例方面，本書第一、二、三篇敘述文字、音韻、名義訓詁的變遷，可算是語言學史的範圍；第五、六篇論修辭、作文之法，可算寫作論的範圍；第七至十六篇則大略按經、史、子、集的分類爲論，敘列其源頭及後世的發展。論者批評說「似國學概論、文學概論、文學史之合體」^⑥。林傳甲這種寫法，與現今通行文學史的模式，或者他所據以爲藍本的日本

中國文學史的體例，都頗有異同^⑦。他之所以要立異，顯然是另有考慮。爲了配合《大學堂章程》的教學要求，固然是一種解釋；但既然他要把這份教材定名爲「中國文學史」，則需要審視的更是他如何面對「文學史」的概念。事實上，大學堂的課程，別有「說文」、「音韻學」、「經學」、「文典」等專科^⑧，林傳甲仍然在他的文學史架構之中，安置這些論述，則他所建立的就不是一個簡單的歷時順序的模式。或者可以說，林傳甲的文學史，是一個由今而古的，以並時架構統合歷史序列的論述模式。他推崇孔子之爲「聖之時」，說：「爲學期於應當世之事業。」（頁三九，又參頁二八）可證他所理解的文學史，其意義就在於致用當世，就在於教育；講「歷代文章源流」，目的就在「源流」中歸納文章的「義法」。所以，比方說，從第十二篇到第十四篇，照看應該是由漢至清的文學史敘述，但林傳甲的篇目卻是「漢魏文體」、「南北朝至隋文體」、「唐宋文體」，將本屬歷時的發展過程轉化爲並時意味極濃的「文體」(style)樣式來作討論，與第七篇論「恒久不刊」的「羣經文體」，以及第八到第十篇論周秦雜記以至子、史的文體等並列。這樣看來，歷史就通過分類的活動而轉化成空間化的排列和組合，演成一個並時的圖案。但有趣的是，林傳甲並非毫無歷時意識；他就在第十二篇篇目下的夾註說：「爲史以時代爲次。」（頁一四三）在第十四篇論「國朝古文之流別」後，總結說：

佛言：「有過去，有未來，無現在。」唐宋至今，皆過去之歷史，至於未來之歲月，

吾輩可不加勉乎！（頁一八四）

他以「無現在」的純歷時觀念去書寫文學的過去，完成的卻是一個「文學史」的空間圖案；這一個弔詭的現象，恰好為我們宣示了文學史書寫這一個活動的奧義：若以恒常為「現在」的文本，去捕捉「無現在」的歷史，時間亦只能夠被「收編」為空間。不單林傳甲的文學史是如此，就如胡適的以「文學革命」的精神去做大型拆建工程的《白話文學史》，魯迅的以「清學」結合「勃蘭兌斯文學史觀」去發掘或者發明中古文學史關鍵的《魏晉風度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何嘗不是以當世意識統攝了過去和未來？當中只有程度的差異、圖式的分殊而已。

（二）

一九一八年謝朓量《中國大文學史》出版。這是二〇年代中廣泛流行的一本文學史；在十年間重印至十三版⁹。無論魯迅的《漢文學史綱要》，抑或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都有其影響的痕跡¹⁰。同樣受到時人重視的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於一九二〇年出版¹¹。這兩本書，份量不一，處理的時域亦不同，但在今人眼中，卻有一項重要的相似之處。葛兆光評論《中國大文學史》說：

這種較少攙入主觀見解，匯集古人評論以顯當時文學觀念，載錄古代傳記以存當時文學歷史，摘引大段作品以明當時創作的「陳列」方式，無意中正好瓦解了強迫性的敘述語言與觀察角度。¹²

周月亮對劉師培的「所引羣書，以類相從，各附案詞，以明文軌」的寫法評論說：

讀這部書像走入一條關於中古文學的卡片長廊。……這種作法的確更凸現了史本身，至少造成了一種純客觀的姿態；非我如斯言，而是史實如此。¹³

謝无量的「陳列」和劉師培的「輯錄」，都是對歷史的一種分解，將事象的呈現方式平面化、空間化。葛兆光說謝著：

基本上是中國傳統的「目錄學」與「史傳體」的自然延伸。

周月亮說劉著：

本書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方面功夫精深，是既可以當魏晉六朝文章目錄來讀，又可視為那時期如林立的文派之學案的。

目錄、史傳、學案，都有異於單一的、線性流動的敘說歷程。我們暫不必標榜前者的優異特出；我們可以思考的是：這一種書寫方式，如果是成功的話，又揭示了文學史寫作活動的哪一些本質？

採用同樣的審思策略，我們會發覺梁啟超在一九二四年寫定的《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又提供了另一種呈現的圖式。夏曉虹指出梁著的一個特色是大量的抄錄原作：

年代越靠前的作品，抄錄越多，幾同輯佚；魏晉以降，雖有選擇，數量仍相當可觀。……卻也有一個好處，即讀者可以直觀地把握文學演進的軌跡，從而大大精簡了史實敘述的文字。

此外，梁著的另一個特點是多用圖表：

《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現存近十二萬字，其中將近六分之一的篇幅是各種圖表。

作品的原樣呈現、以空間化的圖表展示文學過去的樣子，都是在言說敘述以外的表現方式。上面所舉列各種文學史著的現象，正好說明了無論從補漏的角度來看，還是從抗衡的立場著眼，文學史的書寫的確有衝破歷時敘述的訴求。

(三)

如果我們同意文學史的一種書寫傾向是將「文學的過去」圖式化，以便於觀察認知，教育後輩，我們可以想像到作為繪圖者的文學史作者，必然是站在圖外，以權威客觀的姿態，口講手畫；因為他處於「現在」，所描畫的對象是客體化了的「過去」。然而當遇上所謂「現代」（或「當代」，這裏我們暫且把通行的分期概念懸置）文學史這種課題時，書寫人如何處理與被書寫的對象之間的關係，就很有探究的意義了。當下的「現在」如何可以成「史」？其中一種處理的方法，就如林傳甲所提示的佛言「有過去，有未來，無現在」，將「現在」客體化，抽離於當下的經驗，推向時間的長河。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九三二年出版）就代表了這一種思考的傾向。他要解釋的是發生在他身上、周遭的「新文學」現象，但他就把這些現象客體化，放置入他所繪畫的中國文學幾千年來「言志」與「載道」交錯起伏的圖式之中。其實，胡適在一九二三年為《申報》五十周年寫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已有這種連繫古今的做法。他以「白話文學」為中心，推源其傳統到漢魏六朝的樂府詩；這也是後

來《白話文學史》的撰寫基因。

在現存的有關著作中，我們還可以看到以曹聚仁《文壇五十年》（正集、續集，一九五五年出版）為例的另一種處理當世文學史的方法：將文學史轉化成身邊的記憶，以個人的經驗世界去涵攝時代歷史。正如他在續集〈前言〉所宣明：

筆者有機會和文壇重要全家，雖不是全部的，差不多可以說是十分之八九以上，都有過往還，今日寫入現代中國文學史中去的作者，很多是當時的年輕朋友。¹⁵

在書中曹聚仁多番推許陳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一九三〇年出版），但陳著那種緊守繩規的寫法，不見得比曹聚仁順手拈來的拼貼圖更顯示「時」與「史」之間的幽微之處。王宏志說這是「見證文學史」，一種特別的文學史體裁¹⁶。

貳、書寫文學史的過去與未來

上文提到的幾本早期的文學史著，大部分都在北京大學出版的《文學史》集刊上有或詳或略的討論。事實上，在《文學史》結集起來的一羣朋友，對文學史的書寫都很關懷，於

是有書寫「文學史的過去與未來」的想法；對於文學史著作爲文本符號的歷史、文化以至其間思辨的意義，都作過一番思索。本書所錄，其源也在於此。

就本書所集而言，可注意的，除了有關文學史著所揭示的文學史書寫現象之外，還有各篇論文作者對現今學術文化的關懷。其中如夏曉虹論林傳甲、葛兆光論謝无量、周月亮論劉師培，都特別關注文學史與教科書的關係。上文已經論及文學史與教育的必然關係，但這幾位學人立論取向，卻還是來自對當下的反思。「部定教學大綱」與學術空間的互動關係，自然與時空因素緊密扣連；一時之事、一地之事，終會轉成歷史陳跡。但在「無現在」的思量中，我們不得不追問：教育，在文化傳承的過程中，是否應該有一個比較謙遜的姿態？

葛兆光說：

現在的文學史以背景、傳記、思想藝術三分天下的體裁已自成一格，以撰述者口吻寫來的敘述形式也大致定型，文學史成熟得似乎已長大成人的。

他對謝无量的閱讀，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完成的。據他的觀察：

它（謝著）匯集的古人評論至少比今人的敘述更切近當時的文學觀念，它依據古代記

載所陳列的文學史線索至少比今人篩選後排列的次第更吻合當時的文學現象，它羅列摘引的文學本文至少省略了後人的闡釋詮解，更直接地展示了當時的文學創作。①

這幾個「至少」的感懷，來自大家對現今文學史書寫的失望（如果不是恐懼或者抗拒的話）；謝无量的「陳列」、劉師培的「輯錄」、梁啟超的「圖表」，甚至周作人的「規律性周期說」，就成了葛兆光、周月亮、夏曉虹、朱曉進等人寄存浪漫理想的懷舊對象。懷舊的感情在陳平原論魯迅一文中特別濃烈。陳平原的筆觸看來平實不苟，但內中其實滿懷虔敬；他深入探索魯迅「學」與「文」的二重世界，把一本從未實現的「中國文學史」，肉骨成一個中國文人的遺憾。相對來說，陳國球論胡適就缺乏一份溫煦的同情，他因為現世中文化傳統的遺失而對胡適的「文學革命」「呵而問之，以洩憤懣，舒瀉愁思」。王宏志在九〇年的香港寫曹聚仁，也「見證」了這一輩學人對政治、文學、文化身分等等的思考。我們或可有此一問：曹聚仁的軼事拼貼，是否能稍稍減輕大家的歷史背負？

除了緬懷以寄情之外，這一羣作者還嘗試借鏡其他的文化傳統以佐思考。屬於最早期的文學史作者，已明言所撰是沿東洋之例，而其源出歐美。爾後的文學史書寫活動，亦廣受太恩、勃蘭兌斯等人的薰陶。陳清僑、陳國球等在引介盧卡奇和巴赫汀對形式與歷史的省察，捷克布拉格學派的結構文學史觀時，大抵是對當下的文學史思考路向還倖存樂觀的、積極的